

列宁道路

LENIN

2022年 • 夏季刊

目录

中国 1989 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	1
评唐山两女性遭围殴事件	5
疫情防控下的警民冲突——评丹东父女事件	11
阶级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错位——003 号航母下水值得我们欢呼吗？	16
安倍遇刺对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23
不能坐等特色中央“爆雷”	32
停贷断供与房地产爆雷：谁之过，谁之殇？	35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主义与机会主义	42

中国 1989 年革命的三方面局限

June 04, 2022

1989 年革命是一场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从学生运动扩展到各个阶级阶层的民主革命。通常认为，33 年前的今天是黑帮专制政府血腥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开始，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遭到了失败。每到这天前后，专制政府都心有余悸地监视和拘禁与此相关的活动家，变本加厉地强化网络监视和封锁。昨天，知名网红李佳琦在直播带货时展示了坦克造型的蛋糕，随后直播间被关闭。黑帮专制政府处心积虑地不放过任何使人联想到 1989 年革命的元素并加以屏蔽，这种荒唐的行为反而可能造成本来不关心政治的网友探索背后的原因，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统治阶级一方面在教科书上将其表述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淡化影响，另一方面尽全力用沉默来让人民忘记革命。自由派使用“六四事件”、“八九民运”等加以指代，这种淡化斗争色彩的词句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们从改良的角度对 1989 年革命进行纪念与反思。马克思主义者纪念这场民主主义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应该珍视惨痛的失败教训，系统地进行思考和总结，为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充分的准备。

1989 年革命的第一个局限，是民主意识并不彻底。群众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公开领导人及家属的财产等要求，但他们对专制政府却只有模糊的而没有清醒的认知，对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或者某一部分抱有幻想。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乞求政府出面对话，像极了

俄国农民手持圣像乞求沙皇的场面。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不对学生让步，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则对学生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仅仅是赵紫阳的口头承诺，就取得了让学生放弃斗争的效果，更在运动中后期被学生支持，作为反对李鹏、逼迫其下台的武器。实际上，这种名义上的让步只是历来被统治者用来迷惑群众的政治手腕。列宁曾经指出，沙俄的第三届杜马存在着屈从沙皇政府的两个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前者代表农奴主-地主的利益，主张加紧镇压革命，企图完全恢复专制政体，后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徒有其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轮流依靠它们。黑帮首领邓小平同样可以轮流依靠保守派和改革派。赵紫阳等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政治明星，只是在运动高潮时统治集团的一种默许。一旦力量平衡被打破，政府便会公开露出其反革命面目，背弃全部承诺。保守派和改革派固然会发生冲突，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对冲突的任何一方加以‘支持’，因为这种支持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16 卷 134 页）

1989 年革命的第二个局限，是斗争策略不够坚决。尽管具备起义的条件，自由派还是放弃了来之不易的机会。拒绝武装群众使得军队进城时只遭遇了局部的、简陋的街垒战就成功镇压了革命。这实际是上述的思想局限在革命实践上的必然反映。实现人民的民主诉求，需

要推翻专制制度，但是运动的领导者畏首畏尾，寄希望于政府的主动让步而不是推翻政府，不敢提出这个口号，不敢发动群众，暴露出自由派及其知识分子一贯的妥协与叛卖本性。当军事镇压已经成为公开的阴谋，群众从装甲车里也成功夺取了枪支弹药，学生组织才不得不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但为时已晚。即使工人和学生分发了武器，自由派分子刘晓波依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象征性地砸坏枪支，重弹“非暴力”斗争的老调。有些枪支居然被另一拨群众还给了公安局，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从黑帮调集军队到实现镇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一开始调来的军队在人民的劝说下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在这半个月里，群众完全可以进行有组织的起义准备。但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群众继续迷信“人民子弟兵不会屠杀人民”，有意识的进攻只发生在个别地方，如5月22日晚丰台区大井附近。一些学校学生发出的武装斗争号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仓促准备的街垒战只是减缓了军队的推进速度，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1989年革命的第三个局限，也是主要的局限，是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明确的、科学的纲领。当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日渐式微，工人运动却正在兴起。5月18日成立的“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简称“工自联”）标志着运动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专制政府声明绝大多数学生和其他方面人士的本意是好的，是极少数人制造了动乱，对前者进行思想疏导，对“工自联”等组织进行无情打击。这表明政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学生，

而是来自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是使黑帮做出武力镇压决定的直接原因。工人在革命中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成立了“飞虎队”、“敢死队”等群众组织，为街垒战做出突出贡献，一些先锋战士被冠以“暴徒”之名，在“战地法庭”中经仓促审判，英勇就义。由于群龙无首，缺乏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法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将反抗力量融合为有组织的起义。尽管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但是二者在纲领、组织和策略上并未取得一致，也就没有像五四运动那样真正团结起来。分散的斗争力量导致了共同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6月4日并不是黑帮的胜利日，因为在这之后的十几天里，军队还在接二连三遭到群众武装的偷袭。自由派热衷于谈论6月4日，是因为这一天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了清场，也就是说，自由派将学生运动的失败等同于整个斗争的失败，将自由派主导的改良运动看得比工人革命重要。对事件的表述显露出其背后的阶级实质。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领袖声称为民主而奋斗，却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时就已经出现了贪污腐败和争权夺利的行为，他们不配充当群众的向导。无产阶级不组织成为政党，与来自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行使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民主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已经取得的部分民主果实也会丢掉。

只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才能够对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定科学的民主革命纲领。当前黑帮的阶级基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诉求

等在具体内容上相比 1989 年或许发生变化，但是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依然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如列宁对中国民主主义的评价：“它〈指中国无产阶级——笔者注〉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列宁全集》第 2 版增订版第 21 卷 432 页）未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继承和发展 1989 年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内核，同时克服其局限性，以便在更高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评唐山两女性遭围殴事件

June 11, 2022

就在不久前的 2022 年 6 月 10 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针对年轻女性的暴力事件。几名年轻男子在某烧烤店酒后调戏一名年轻女性，受到拒绝和反抗后，围殴暴打这位女孩及其女伴，致女孩重伤。事情被曝光后，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唐山政法委表示已抓捕早被锁定的伤人者，唐山妇联则声称 2 名女性目前并无生命危险。胡锡进还发文说打人者是男人中的人渣，把事情往性别对立和道德批判方向引导。《列宁道路》的评论，准备首先说明此事背后深层

的经济社会原因，再对网上的打杀之声进行分析，最后揭露黑帮专制政府及其舆论代表的表现。

一次极端事件成为热点的时候，往往有许许多多非常恶劣、但不那么为人知晓的事情已经发生。在特色黑帮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女性地位的下降，已经被普遍地感受到。甚至像丰县八孩女那样沦为奴隶的现象，都已经发生并受到以女性地位低下著称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嘲笑。出现调戏女性不成转而围殴的事情，就不那么让人惊奇了。女性地位下降、调戏围殴女性、甚至将女性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和奴隶的趋势，有两重基本的原因。第一重原因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因，即万物商品化、特别是劳动力商品化会产生把女性也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的趋向。这种趋向，和万物商品化必将引起的反抗一样，会引起各阶级女性，甚至是资产阶级女性的反抗。可以设想，能够存在这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给予女性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仍然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哪怕保留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摧毁一时获得的性别解放。第二重原因是专制政府的原因，即由于其镇压和破坏包括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在内的一般民主运动，导致女性地位比起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普遍更为恶劣。推翻黑帮专制政府，建立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会改良妇女的处境；但要彻底解放妇女，则必须更进一步，非有消灭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分析的因素，那就是饮酒。围殴女孩是那几

名男性在酒后所为。轻薄女性的念想在酒前就已经存在，像前面所说明的那样是由资本主义的一般原因和黑帮专制的特殊原因共同造成的；而酒精的作用，让这些冲动更直白和赤裸地表现了出来。那酒精泛滥的原因何在呢？自然是因为困苦的生活需要麻痹的同时，还不仅能够产生一个资本积累和投机的领域，而且能为特色黑帮提供丰厚的税源以维护其统治。据说，北京的精神病人，包括抑郁症患者，在飞快地增长，以致于在多数医院由于极端疫情防控政策而亏损的同时，精神病院却生意兴隆。这应该不是特色首都的特有现象，而是全国的共同趋势。在相当数量的人找不到活路的时候，用酒精去麻醉他们，对特色黑帮来说是个高明的选择，哪怕明知饮酒会造成几乎所有癌症发病率的上升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由于黑帮专制统治而进一步恶化了。资本需要新的积累领域，黑帮把酿酒这一在社会主义时期受到限制的行业放开甚至进行扶持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像只有大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才能消费得起的茅台酒变成投机的对象，更是这种资本过剩而走向疯狂金融化的登峰造极的表现。特色黑帮乐于看到烟酒这类哪怕是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也本应受到限制的行业的扩张，是因为这不仅麻痹了苦痛或空虚的灵魂，不仅让统治者能够纸醉金迷、寻欢作乐，而且还提供了他们维持其专制统治、特别是维持其暴力机器的税收。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买烟酒的税金去扩大镇压他们反抗的军队和警察，为此特色黑帮是不惜付出几条酒后伤人的生命代价的。

围殴女性这样恶劣的事件，不能不引起群众的义愤。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许多群众，受到特色黑帮愚民政策的毒害，不能够深究这类事件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是自发地、简单地认为这是由于个人品性的低劣造成的。这样的朴素看法有其合理性，那就是即使这样的事件有其经济社会原因，作为这些社会关系人格化身的施暴者仍需要承担个人责任。这样朴素看法的不合理性，则一方面表现于其不能够理解事件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表现于把解决这类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严刑峻法上。在当前的条件下，也就是寄托在黑帮专制政府严惩凶手这样的方案上。这种把出路幻想在造成恶行的首要根源身上的看法，表现了群众的不觉悟，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工作的缺失。我们既要促进自己的工作，又要努力改变群众的不觉悟、仍然相信黑帮政府的状态。迎合群众的不觉悟状态，向黑帮专制政府呼吁枪毙凶手的声音，不应该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刊物上。

黑帮老手们显然嗅到了这里面的机会，那就是利用群众的不觉悟、利用个别马克思主义刊物原则的动摇，去加强自己的蒙昧宣传，去树立自己的“慈父”形象。唐山黑帮政法委宣布锁定凶手后已经抓捕了两名嫌疑人，并通报自己“将严格依法处置，坚决维护受害者合法权益”（见网传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警情续报”）。可正是因为黑帮政法委和警察不仅镇压力图重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而且镇压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才造成了女性

地位的低落，造成了百千万女性不得不出卖肉体、经常遭受殴打、极端情况下沦为奴隶的现实。赵姓的家仆们可能针对极端情况、特别是造成舆论风波的事件有所行动，但经这种行动强化的幻想却让无数起不那么极端、没有形成网络关注焦点的事件成为常态。这恰恰是改良主义的命定结果。特别让我们痛心的是黑帮妇联关于2名被打女性没有生命危险的声明。网传图片显示，一名被打女性满身血迹、遍体鳞伤。还有网络传闻说，一名被打女性有生命危险。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丝毫不相信黑帮妇联的声明。武汉疫情期间，“吹哨人”李文亮为了黑帮泄愤后又要平息民愤的需要，先是被派去接触凶险的病毒，再在已经没有抢救可能后用非人道的手段强行维持了几个小时的生命。类似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这个被围殴的女孩的身上。即使她生还的希望渺茫，但特色黑帮需要她等舆论关注这件事的时间过去后再死。对于黑帮来说，最理想的事件发展路径莫过于，被围殴的女孩生命垂危，在特色政府的全力抢救之下她终于生还，而且因为严惩了凶手，特色黑帮维护公序良俗的超阶级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我们则必须把他们的这张画皮揭掉，让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看清这种处理方式的极端伪善，并认识到真正的出路在于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特色黑帮的非正式发言人胡锡进，没有错过这个散布幻想的时机。他在舆论上配合了唐山市黑帮们的行动，第一时间试图去强化那种信任黑帮专制政府主持正义的幻想。而且他还有所发挥，进一步利用了

经其矮化的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他居然说：“保护女人才是男人的天性。”阶级对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黑帮专制统治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都不见了，有的只是男女的差别，而且错不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黑帮专制统治，而在于有的男人不但不保护女人，还殴打女人！于是，在胡前主编那里，问题的出路变成了政府“报应”那些不知保护女人的男人，以传播“男人一定要保护女人”这个胡前主编多年以来牢记的道理，然后世界就和谐了。在散布对专制政府幻想、利用性别差别这项比赛上，胡前主编会长久地保持世界纪录。我们则须要在抨击专制政府、宣传性别对立基于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否则无法战胜胡前主编这样的黑帮吹鼓手的影响。

现在，继唐山黑帮政法委、黑帮妇联和黑帮舆论走狗世界纪录保持者胡锡进之后，特色的人民日报微博也迅速领会了这一暴力事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机会。这个微博算是黑帮正式的喉舌，因此没有讲出胡主编所说的“保护女人才是男人的天性”那样甚至可以说带有一些色情意味的浑话来，而是装模作样地说群殴女子事件“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让施暴者付出沉重代价”。言下之意是，特色黑帮的专政机关，会与其意识形态机关紧密配合，通过严惩甚至枪毙施暴者，共同来进一步塑造他们“大众的安全感”的维护者的形象。实际上，特色黑帮的专政机关，正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安全感”最大的伤害来源，因为只要有所反抗，伤害到了官僚资产阶级和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安全感”，这些鹰犬就会毫不犹豫地对抗敢于反抗的劳动群众重拳出击。一个阶级的安全感，必然会造成另一个阶级的不安全感，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现实。“大众的安全感”这样的话从特色黑帮的宣传机器那里散布出来，其用意只能理解为欺骗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去相信幻想。

不觉悟的群众相信幻想，黑帮散布和强化幻想，而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偶尔动摇、暂时不能团结起来通过有组织的工作来改变这种局面，这就是今日的现实。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们会通过把自己联合为政党，通过有组织的、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去把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提高到自己纲领的水平，并终将共同团结起来改变这样的困难局面。这一历史进程，无论黑帮及其代言人怎样竭力散布对自己的信任，都无法阻止。

疫情防控下的警民冲突——评丹东父女事件

June 25, 2022

日前曝出的丹东父女“袭警案”是一场疫情防控背景下的警民冲突。丹东父女持社区通行证看病（取药），但仍因黄码被警察强制拦停。女子随后提出开车回家的要求也被阻止，冲突中她被一位年轻男性警察推倒在地，七十高龄的父亲愤然拍向警察面部。视频中可以

看出老人还击力道并不大，但警察顺势捂脸倒地，向同事确认“录下来了”后方轻松起身，这个保留“袭警”证据以便给群众定罪的流程走得不可谓不熟练。该事件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两个矛盾，应加以分析，一是丹东封城所暴露的防疫政策危害，二是中国的警民关系和司法制度之弊。

丹东封城两个月来，其惨状不亚于上海，却同云南瑞丽一般始终难以获得关注。辽宁丹东、云南瑞丽、广西百色…这些边境口岸小城，代表了被动态清零政策牺牲掉的另一种城市命运。停工停产，食物短缺、价格奇高，火车快递停运，群众因病不得救治而死、因无法还清房贷车贷自杀，这些由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灾难已经屡见不鲜。而相较于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不同的是，丹东这样的边境小城自疫情以来已长期处于封城状态。三年间封城为常态，解封为偶然，防疫严控程度与疫情严重程度完全不成正比，只要有新增就封城，“不满足连续 14 天全市无新增就绝不解封”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这些边境城市被长期封控的表面原因是地处口岸外防输入的压力巨大，而真实原因是城市经济体量小、群众组织程度低，导致封城的社会成本低，官僚为了政绩和殊荣可以不断层层加码，随意一刀切。辽宁省 9 天前还给丹东冠以防止疫情外溢的“英雄城市”称号，官僚统治阶级为了保住乌纱和升官发财哪管人民死活！而使之更成为一出官僚滑稽剧的转折点的是，丹东父女袭警事件刚一引起舆论关注，丹东竟能在两日之内在全市恢复生产生活（非管控区市民可以自由活动，取消车辆货运

通行限制，快递也开始运营)，足见决定封城与否的并非疫情客观形势，而是社会舆论形势，是群众和官僚的力量对比形势。地方官僚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只在疫情防控政绩，而对无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满不在乎，这是专制政府依靠官僚机关和暴力机器防控疫情的必然结果。在“袭警闹剧”中，群众的不满情绪指向的不仅仅是为人民办事的警察暴力机器，更是官僚体制下的动态清零封控政策。随着新一波疫情传染力加强，全国各地群众大都对封城政策有了切身体会甚至切肤之痛，上海疫情的反向宣传更是使群众对所谓动态清零政策的不满日增。我们应该揭露专制政府不敢相信和依靠群众，惮于任何形式的群众组织，从而无力抗击疫情和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腐朽本质，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已有先例的群防群控才是根治疫情的出路。

官僚统治阶级既然不敢依靠群众防治疫情，自然只能依靠官僚体制和暴力机器。警民冲突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在疫情背景下却格外讽刺。疫情防控打着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旗号，但执行者却对群众的生命健康不管不问，只照搬黄码不准过的统治阶级指令。随后的警情通报中，父女外出原因、警察推倒该女子都被刻意隐去，而描述成父女拒不配合防疫规定并主动袭警，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和涉嫌袭警罪的刑事强制措施。公安局本欲以此案作为捍卫暴力国家机器权威的杀鸡儆猴案，却不料视频流出引起全网不满。胡锡进将冲突归结为警察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方式不佳（没有考虑到舆论），从而避免将矛头

指向国家机器本身的统治性质，这样的观点具有更大的迷惑性。警察的蛮横、不通情理，录下来保留袭警证据时所表现的对法律国家机器的熟练操纵，其实反映了警察执法的宗旨非但不是服务人民，反而是将人民都视作威胁自身安全的潜在罪犯（有警察指出在职业培训中受到的教育是，冲撞关卡的车很可能恶意撞伤撞死警察，故须避免站在关卡前阻拦）；警察所受的“教育”不是关于如何保护人民，而是如何在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冲突中保护自己、如何利用法律惩治胆敢冒犯警察权威的暴徒。以“袭警罪”对七十老翁处以刑事强制措施，也映射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残酷虚伪。郑州官员违规对 1317 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只是撤职记过了事，并未启动法律程序，而父女买药却被刑事拘留。论社会影响之恶劣，论对所谓防疫大局的冲击，前者远甚于后者，而处罚则远轻于后者。这个中国司法制度的奇特不等式，正如列宁所说，“就像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反映出我们警察国家的整个制度”（列宁《打吧，但不要打死》）。

这里，我们还需要分析一下所谓的“袭警罪”。这个罪名在欧美法系中常见，但在中国落地生根其实是中国黑帮专制走入“新时代”的产物。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自然没有什么袭警罪，只对妨害公务的严重罪行有一般规定。文革期间的《公安六条》不仅没有袭警罪，还有袭击革命组织罪、镇压革命群众罪：其中第（三）条规定“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第（六）条规定“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

依法查办。” 资产阶级复辟后制定的 1979 年刑法、1997 年刑法则分别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单独入罪。此时“袭警行为”（应读作群众的愤怒反抗）只是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一种类型来处罚，还没有被特别凸显，而“暴力、威胁方法”的模糊用语则无疑给公检法滥用这一罪名敞开了大门。从此妨害公务罪与寻衅滋事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等口袋罪一起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镇压群众的有利工具。新时代的特色政府“依法治国”，加紧了用法律为黑帮暴力保驾护航的步伐。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条款，将暴力袭警行为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从重处罚情形。2019 年两高和公安部印发的《惩治袭警行为意见》司法解释中对于使用凶器、驾驶机动车袭警的行为强调要在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再从重处罚（这当然非常合理，刁民敢于袭警已属大逆不道，持械行凶当然更是十恶不赦！）。而 2021 年 3 月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则正式将袭警行为单独成罪，从此中国敢于反抗警察权威的刁民们有了“袭警罪”这顶新帽子，新时代黑帮法治建设也翻开了新篇章。据官方数据显示，仅 2021 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触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的 2085 人提起公诉，其中袭警罪不负众望地以 1444 人位居榜首，这 1444 人中该有多少防控政策逼出来的“袭警”，该有多少对丹东父女！

因此袭警罪在中国的产生过程，就是特色政府逐步强化国家暴力

机器、强化专制统治的过程，就是特色资产阶级从复辟一路走向黑帮专制统治的过程。袭警罪就是恐吓人民、维护警察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威严的法律工具，在这里，所谓法律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统治阶级及其暴力机器镇压群众和自我维护的根据。我们应该通过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使群众抛弃用警察维护其生命健康的幻想，主张废除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而代之以人民自卫。将彻底否定中特专制下的疫情防控政策、反对常备军和警察制度的观点灌输到群众中去，并启发群众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政府才能实现群防群控和人民自卫，这是当代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阶级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错位——003 号航母下水值得我们欢呼吗？

西江月 • June 28, 2022

2022 年 6 月 17 日，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满载排水量 8 万吨的 003 号航母正式下水，并被命名为“福建舰”。引人关注的是，003 号航母跨过蒸气弹射阶段，直接实现了电磁弹射，从而大大提高了舰载机的起飞效率和起飞重量，这对于提升战斗力来说非常重要。尤其令国内军迷们自豪的是，003 号航母电磁弹射器采用的中压直流技术相较于美国“福特号”采用的中压交流电磁弹射技术更为稳定，实现了

“要领先就领先美国”的目标。此外，从 003 号的甲板面积来看，它的舰载机容量可能与“尼米兹级”持平。因此，评论认为，虽然 003 航母并非核动力，但其综合战力或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美军的“小鹰号”航母。美国《外交家》杂志也称赞“福建舰”是“有史以来在美国以外建造的最大、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这一巨大的军事进步激起了许多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这盛世，如您所愿”（革命先烈们泉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他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是今天这样的盛世吗？）之类的感慨又开始疯狂刷屏。同时，003 号航母的命名也激起了关于收复台湾、两岸一统的无限遐想。在一片欢呼的氛围下，似乎每个人都在国家走向强盛的伟大征程中“与有荣焉”。可是，当人们把眼光转向唐山和丹东，转向河南的村镇银行和“赋红码”，转向 18% 的青年失业率和不断发生的裁员，转向疫情下艰难度日的劳动者和本不应该逝去的鲜活生命，心里却不得不感到失落、迷茫、不安和愤怒，还有，深深的无力。

对祖国充满希望，对自己的前途却感到迷茫；前一秒为福建舰欢呼，后一秒为唐山恐慌——“新时代”就这样以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展现在我们面前。耗资巨大的航母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安全感，相反，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却日益让人们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人民将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和救命钱存在以国家信誉担保的村镇银行，突然之间无法取现，而且还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危险；普通百姓伪造几

个健康码被刑事拘留，郑州市政法委副书记为了维稳给上千名储户强行“赋红码”却只得到了党纪处分，真不知道特色法律究竟是在为什么样的人民服务？唐山恶劣的黑社会打人事件因为上热搜被关注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处理，可是，重庆交巡警当街开枪杀人的事件似乎已经无声无息了。

因此，对老百姓来说，航母带来自豪感和安全感是一时的、虚幻的，如果在现实中能够不受权力和资本侵害并拥有反抗权力和资本压迫的力量，这样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才是更长久、更真实的。保护权力和资本利益的政府恰恰不愿看到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想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将自己和人民绑定在一起，让人民误以为处在“国家”这个“虚幻共同体”中的所有人拥有一致的利益，从而在为国奋斗、抵御外敌的“同仇敌愾”中忽视甚至忘记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看到这里，自觉或不自觉的国家主义者肯定坐不住了。你这是反对中国造航母吗？不造航母，难道受美国人欺负？不造航母，怎么保卫中国的海外利益？不造航母，怎么收复台湾？在中美竞争的大形势下，你挑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究竟意欲何为？难道你想让中国在中美竞争中失败吗？

要回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问题出发点上的根本差异。与国家主义者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问题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国家是一个利益统一体，

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对一国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敌人不是抽象的“外国”，而是本国和外国的统治阶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劳动者组织起来对统治阶级形成威胁的时候，本国统治者往往会“摒弃前嫌”，联合外国统治者来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外国的劳动者恰恰是本国劳动者的朋友，他们走上战场成为敌人完全是充当了统治者的工具和不同利益集团竞争的牺牲品。

因此，要讨论一个国家的任何社会问题，抽象地将“我们”作为先验的主体实质上都是一种欺骗行为。对于劳动者来说，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造了航母，劳动者就不受统治者的欺负了吗？造了航母，中国在海外所获取的利益就能造福于民了吗？如果依靠航母收复台湾，劳动者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牺牲，中国政府收复台湾能让两岸劳动者过的更好吗？在中美竞争的大形势下，劳动者应该如何对待中国政府，什么样的立场才是对劳动者真正有利的？

只要不无视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并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以上问题应该不难给出回答。

第一，造了航母，中国可能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会更有底气，但这丝毫不改变中国劳动者受中国统治者欺负、统治、压迫的现实。近期暴露出来的暴力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看不见的暴力和国家机器带来的结构性暴力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工人运动

和各种民主运动的镇压。

第二，先不谈中国是否能够取代美国霸权的问题，即便如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从而能够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可是，如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不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境遇真的能够变好吗？古人早就说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请看看今天的美国，大多数底层人民难道不是依然遭受着少数人的剥削压迫吗？占领华尔街的人民不是喊出了 99%对 1%的口号吗？难道期待中国成为新霸主的人认为自己会是那 1%？

第三，中国在海外所获取的利益主要是靠掠夺他国资源、剥削他国国家劳动者所得来的，并不是什么和平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本质就是帝国主义扩张。国家主义者鼓吹大造航母的真实想法是想翻身成为“列强”，持剑经商，建立局部霸权，进而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因此，出现什么“我们终于成为了棋手”“当拥有 1 艘航母的时候，你是打破地区平衡的威胁；当拥有 2 艘航母的时候，你是世界和平的威胁；当拥有 10 艘航母的时候，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之类的段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收复台湾绝不只是意味着国家统一的荣光，它必然意味着高烈度的战争和残酷的牺牲。那么，承担牺牲的会是谁呢？毫无疑问是两岸普通的士兵和可能被征召入伍的劳动者，而绝不是两岸的权贵和资本家。此外，在两岸都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大陆发起的战

争何谈什么正义性？大陆军队又何以有脸面自称“解放军”？大陆的“解放战争”能够给台湾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

最后，中美帝国主义竞争中谁胜谁败在目前的情况来说并不是劳动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直接影响和决定的。但是，国家主义者以“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试图消解和禁止劳动者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做法无疑是反动的。对于劳动者来说，唯一正确和有利的原则就是站在自身立场上进行反专制、反资本的宣传和组织行动，而不是成为国家的附庸和工具。以俄乌战争为例，普京政府打着反击北约东扩的旗号，实际上却想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而充当战争代价是俄罗斯普通群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应当像现在的俄共那样成为统治者的战争动员工具，而应该利用战争可能造成的危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只要进行反专制、反资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实际上必然削弱本国政府对外战争的能力，因而客观上就会促进本国政府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竞争中必然持“失败主义”的立场。

只有站稳立场，明确自身任务，进行原则坚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把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引导向阶级矛盾，把各个领域的斗争统一到阶级斗争，同时根据危机的程度、革命形势的发展及阶级力量对比，在不同阶段进行建立组织，教育和团结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直至夺取政权等一系列行动。只有当国家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盟手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在革命战争中成为护

国派，而航母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从帝国主义争霸的工具变成捍卫革命政权的武器。也只有在那时，广大士兵和劳动者才会真正明白为何而战，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愈演愈烈，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展，各个大国争夺世界并分裂为不同阵营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美国不断挑动台湾问题，中国国防部长则发出了战争的警告；北约国家拉拢日韩召开峰会，中俄牵头的金砖国家组织同样在积极行动笼络诸多发展中国家；立陶宛宣布封锁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普京则声称将会考虑卢卡申科提出的“让白俄罗斯拥有核武器”的请求。身处危机之中的各国统治者都正在把矛盾往国家主义的方向推动，群众也被“爱国主义”的社会情绪所笼罩。

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努力让群众摆脱自身阶级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错位，认识到“国家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认识到“主要敌人在国内”，劳动者主要的敌人不是别的国家，而是本国的统治者。只有各个国家的劳动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形成反对各自国家统治者的联合，以人民的组织力量反对本国的军事扩张，才能真正结束战争，才能战胜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否则，今天的世界极有可能重演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人民再次在“爱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口号驱使下成为帝国主义竞争的炮灰。

安倍遇刺对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July 10, 2022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不治身亡。这是撼动日本政坛的一件大事，却是日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件小事。马克思主义者不应为这一事件喝彩，因为安倍之死并不能改变日本的资本主义现状，刺杀这种个人恐怖主义手段也不能启发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反而激起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狂欢。为此，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反对黑帮利用安倍之死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

安倍遇刺是二十一世纪第一起大国政要遇刺，自然引发世界波澜，但引起中国舆论场的特别狂欢，主要是近年来特色黑帮持之以恒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黑帮长期采取愚民政策，试图将劳动人民彻底变成只知劳作不懂反抗的牛马，一面利用互联网防火墙封锁国际信息，一面精心挑选炒作议题鼓动民族主义。在对日问题上，黑帮没有正确引导群众由于抗日战争产生的朴素爱国情绪，反而大加利用。用民族取代阶级、用民族复兴叙事取代革命叙事的自然结果就是抗日战争的内涵从反帝反法西斯战争变成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自2012年起民间对日情绪日渐升温，钓鱼岛争端、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东京奥运会、抵制反华亲日艺人、抵制和服与“以倭代唐”……这些议题成为民族情绪的集中爆发点，很大程度上是黑帮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的结果。比如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

黑帮闭口不谈日本没有官方教科书制度，教材是由民间出版社自行编写、学校自行采购，也不谈否认侵华战争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而是利用信息差将少数右翼分子行为炒作成日本政府官方行为来挑起国内群众对整个日本的仇视情绪。

2012 年安倍再次上台以来，客观上就成为了特色黑帮煽动仇日情绪的工具人。黑帮从不会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政治教育，从不试图对群众真正讲清楚日本的资本主义状况和上层政治建筑以及安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不试图真正讲清楚安倍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对日本无产阶级的影响（只会在攻击安倍时顺带提及），只是选择性强调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其外祖父是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等细枝末节，将安倍塑造成极端反华的极右翼势力代表。但公允地说，安倍晋三属于传统的保守派右翼，采取表面改良实质偏右的国内政策，奉行中美均衡的外交战略，扩大中日贸易和民间交流，是一个老练稳健的右翼政客，这显然与国内的安倍形象大相径庭。

安倍死后，黑帮表面上给予礼节性尊重，暗地释放默契的狂欢信号，比如河南共青团转发霰弹枪视频，并评论“非常好用”。民间舆论场爆发出的震天欢呼，使得著名的民族主义旗手胡锡进和金灿荣都心悸不已，不得不泼水降温，表示要“对生命抱有尊重”。右翼政客安倍晋三的死当然不值得无产阶级同情惋惜，死就死了，轻于鸿毛。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孤立地看待安倍之死，要看到黑帮长期以来借安倍打仇日牌的策略，要反对黑帮借安倍之死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

要指出安倍的右翼实质，更要揭露黑帮的政治欺骗。

在反对民族主义的左派声音中，我们要特别指出一种。有的左派认为安倍之死“虽然或许没法彻底改变糟糕的世道，但难道是一件坏事吗？”“吵什么吵偷着乐就完事了”（微信公众号“无隅”）。虽然作者自认为反对民族主义，但没有意识到这种论调客观上与黑帮的民族主义合流，汇入了为安倍之死欢呼喝彩的大合唱之中，用看热闹作壁上观的轻佻心理取代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革命自觉，是我们格外自警的。

第二，安倍之死不会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状况，不应夸大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历史一般趋势的不是个别英雄人物，而是社会的生产力及其内部矛盾。安倍之死并不会实质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不值得夸大其影响。

有评论认为安倍之死“将打破东北亚的政治平衡”，这种说法错在夸大了统治者个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而缩小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评论认为该事件“足以成为战后日本政治最大事件”，这种说法错在将政治狭隘化为议会斗争、权力更迭，忽略了真正的政治是以群众、阶级、政党为主体的大规模革命实践。归根到底，决定日本政治命运的不是

一两个资深政客的生死，而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日本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发展水平。

安倍之死不能改变日本的资本主义现状。日本在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漫长的资本主义衰退周期，2012 年以来安倍在经济上执行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其实还是打金融财政组合拳，通过拼命印钞发债来刺激经济。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是滥发货币导致日元贬物价价飞涨；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质是依靠政府向央行举债拉动投资，自2018 年起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远超欧美水平；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更是形左实右形同虚设，包括增加女性就业实质让女性成为廉价零工、降低公司税却提高消费税、提高企业员工退休年龄但公务员不变、修改劳动法将每月加班时间从 80 小时降为 45 小时但又规定繁忙时期可加班 100 小时（繁忙时期可达六个月）……安倍经济学虽然实现了通缩变通胀，但只是经济数据变好看，日元贬值有利于企业出口，但物价飞涨增加群众生活成本，日本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日元兑美元汇率已降低至二十年来最低点，社会矛盾将继续激化，类似刺杀安倍的自发反抗将越来越多。

安倍没有做到的经济复苏和社会改良，其继任者也不可能做到。安倍之死或将使自民党内的岸田文雄集团彻底取代安倍集团全面执政，岸田集团或许会局部调整安倍政府的内外方针，比如更加亲美或

对华示好或对韩缓和，但日本社会进一步保守化的趋势不会变。日本统治阶级与深陷资本主义危机的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加速右倾化的可能会增大。但这些都与安倍的生死无关，即使安倍还未下台，或者中枪未死仍能保持其政治影响，日本也还将会继续右转。正如二二六兵变如果成功，皇道派取代统制派上台，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会迅速完成向法西斯化的转变，甚至更快。

这里不妨化用恩格斯对拿破仑的评价来形容安倍：“恰巧安倍晋三这个长期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的东京人做了被衰退弄得精疲力竭的日本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右翼裱糊匠，这是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安倍晋三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第三，阶级斗争而非刺杀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

刺杀安倍的凶手已被捕，行刺动机尚未明确，日媒报道凶手是一名退役的海上自卫队队员，也有消息说其有宗教团体、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背景。但我们并不关心凶手行刺的具体原因，因为政治家没有私仇。一方面政治家作为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政策主张反映的是阶级利害，而非个人好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客本人往往是统治阶级一份子，即使所谓的私人恩怨也反映了其所属阶层社会关系的特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强奸保姆以至于被其兄长所杀，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这些黑帮政客的罪恶不是纯粹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反映出整个统治阶级的制度性腐朽。

恩格斯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的反抗（《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无论凶手行刺的具体动机如何，我们都将其看作是个人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反抗。我们同情凶手过去可能的不幸遭遇，赞许其将愤怒的枪口对准统治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但是反对他采取的刺杀手段，惋惜他空有死志而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刺杀，他们说刺杀太过血腥残忍，说刺杀破坏民主政治，说刺杀是极端暴力犯罪。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刺杀的理由与这些都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刺杀，因为个人恐怖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政治刺杀并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反而让革命志士白白牺牲。阶级斗争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只有通过建立集中制政党使无产阶级觉悟和团结起来，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才能改天换地，建立新世界。

刺杀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政治动荡，但从未真正改变现代世界历史。在统治者个人对统治秩序具有较大影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刺杀君主或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会因为权力交替产生政治动荡，比如凯撒之死延缓了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步伐。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普遍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稳定有序的权力交接制度，前台个别政治人物的更替丝毫不影响整个统治阶级继续维持其统治，刺杀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其有限，并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比如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只是影响肯尼迪家族的兴衰，并不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以来各国的革命实践都证明，刺杀这样的个人恐怖主义手段不能实现革命目标，只能虚掷革命者的鲜血。俄国民粹派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牺牲了包括列宁哥哥在内的无数革命者，但即使成功刺杀了沙皇，也并没有为俄国革命开辟新路。中国同盟会频频暗杀满清大员，徐锡麟刺杀恩铭失败后肝脏被炒熟下酒，当时还是革命者的汪精卫在谋刺载沣失败后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冲天的革命壮志还没有机会和新的历史主体结合。日本六七十年代的赤军组织也从事恐怖活动，初期的“城市游击战”试图在大城市建立脱离工人的军事组织以进行武装斗争，后来试图通过劫机绑架、屠杀平民这样的恐怖主义活动来号召世界革命，其实反映了革命转向低潮后绝望失常的知识分子心理。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们空有热血，却舍难取易，不知道探索科学的革命道路比坦然赴死更加艰难、更加重要。

支持刺杀的一个理由是“激发论”，认为刺杀政治人物的壮举可以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但光凭革命者的牺牲并不能激发群众的觉悟，鲁迅小说《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就变成了围观看客的人血馒头。事实上实际生活的丑恶现象已经足以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实际生活所不能激发的也不可能通过个人与政府的单独决斗来实现。只有大规模的公开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鼓舞人心，只有通过先锋队对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政治教育才能产生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支持刺杀的另一个理由是“力量转换论”，认为刺杀毕竟会使得反革命与革命的力量此消彼长，“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

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列宁《论革命冒险主义》）。但革命实践证明，个人恐怖主义不仅无法真正威胁反动政府，反而会使得革命组织遭到镇压，敌我力量此长彼消。采取脱离群众的恐怖主义手段反过来会更有利于统治阶级争取群众，趁机扩张国家机器的力量，出台更严格的社会控制方案，进一步剥夺群众所剩无几的政治自由。

这里还要强调，无产阶级反对的是无组织的个人恐怖主义，反对的是将个人恐怖行动而非公开阶级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手段，但并不原则上排斥恐怖手段。“在原则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而且也不可能拒绝恐怖手段。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军队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完全是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列宁《从何着手》）对于革命者而言，个人恐怖主义和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都使得宝贵的觉悟力量未能与工人运动结合，放弃了刻不容缓的对工人进行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工作。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一切的关键在于能否组织起来。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将一事无成，即使采用再英勇的刺杀壮举也难以激发；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将无所不能，会使用包括恐怖手段在内的一切行动来改天换地。

在安倍之死带来的舆论浪潮中，除了一边倒的民族主义和少数人道主义声音外，还出现了借机反对特色黑帮的潜流。一些群众（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交平台转发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表达希望中国的黑帮领袖遇刺的愿望，以至于微博知乎等平台上“可

惜不是你” 词条一度被屏蔽。这反映了疫情危机以来群众对黑帮统治的日益不满，但也说明许多不满人群没有明确意识到习本人只是特色黑帮统治的代表，没有明确意识到刺杀手段不可能改变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推翻头顶的专制政府，继而推翻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这也佐证了我们长篇大论刺杀问题的必要性。

安倍之死是日本政坛的一次偶然性事件，远远称不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最后可以顺便谈谈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偶然危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迁就眼前微小的暂时性事变，不应被群众一时的情绪激荡而不能自己，不应将风吹草动夸大为大洪水。但也时刻不忘却挖掘深埋在群众经济生活里的革命动因，不放过从任何局部矛盾中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并认识到背后的系统性危机，不放过从群众任何一点行动中发现力量，不放弃利用每一次危机进行揭露和政治教育。也只有基于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长远需要来坚定原则，革命者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危机，使每一次危机和事变无论大小都能往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方向转变。在今日之中国，这样的原则就是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将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小组联合成政党，在统一的革命纲领下完成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使命。

在世界资本主义矛盾越来越通过偶然性危机爆发出来的今天，我们愿意不厌其烦地复读列宁在《从何着手》说过的箴言：

“专制制度完全可能由于某一次自发的爆发或无法预料的政治

冲突的压力而垮台，但是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不是陷入冒险主义，决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这种爆发和冲突上面。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进行自己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依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变化’而手足无措。”

不能坐等特色中央“爆雷”

读者来稿 • July 11, 2022

如果说河南和郑州的地方政府从一年前 7.20 的暴雨的应急处理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或者坚持了什么“优良作风”的话，那就是对群众的呼吁和斗争绝不能心慈手软，而必须两面三刀、笑里藏刀！

一年后的今天，河南省政府正是把这种把戏玩到了极致：一面对储户赋红码以阻止其进入郑州维权，一方面“诚恳”接受媒体舆论的批评，下马几个芝麻大的科员小官；一面大批大批地组织警力雇佣黑帮对人民银行前的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上千群众大打出手（这次就没有什么媒体敢于站出来批评了），一面立即宣布案件的破获取得“重大进展”，以安抚维权群众和吃瓜群众，瓦解群众的斗争。如果说特色中央今年要颁发一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奖章的话，丰县和唐山乃至上海的政府只能排在第二、三、四位，第一名一定是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当之莫属的。

自 2020 年初的疫情以来，爆雷的地方政府接二连三，且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以及一些知名的三线城市（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政府的爆雷才会真正被舆论关注）。特色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深知人们对地方政府的失望同人们对中央的失望只有一墙之隔，因此他必须要把这堵墙筑牢，也就是想千方万法维护自身的信誉。在各个地方政府的爆雷发展到最高潮时，当群众的怒火燃烧得最旺的时候，中央政府从来是默不作声的——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到群众在舆论或在街头的势头开始减弱，上一级政府（譬如对丰县，则是其上一级的徐州市政府或江苏省政府）这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但即使这时候，它也从不愿屈身同民众对话，而是发一些“重磅”的“情况通报”、“人事任免”，不过就是把人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再说一遍，但它声称自己是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的，同时再罢免几个与事件直接相关官员。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对待群众的运动或舆论时候所坚持的套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和群众“打太极”——面子一定要做足，下手则要稳准狠，同时利用下级政府的信任危机来强化上级政府的“青天大老爷”形象。

群众的运动及其舆论攻势目前还局限在对于地方政府的愤恨上，而没有上升到直指中央政府这个大后台的水平，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1. 群众运动当前本身的认识局限性，不少人还意识不到中央政府

乃是地方政府真正的后台，而是把地方政府的问题归咎于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令；

2. 目前的形势下地方政府的爆雷总是接二连三地或者甚至只是零星地出现，表现出了一种“偶然性”，而非全面地集体性地爆掉，这阻碍了人们认识这种“偶然性”背后这种爆雷之所以发生的必然原因；

3. 如上所说，中央政府有意丢卒保帅，维护自己的“青天大老爷”形象。

因此，革命党和每一个觉悟的工人、群众应当积极地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偶然的”地方政府爆雷的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的“怪兽”。当前经济愈发显示出的颓势使我们相信，政府的“全面爆雷”就在不久的将来，另一种可能则是特色通过对外战争以给自己续命，但这不过只是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拖延自己“爆雷”的时间。革命党应当在这个“全面爆雷”之前在思想和物质上尽可能充分地将群众武装和组织起来（这也要求革命党自身首先要组织起来），绝不能等待一个“全面爆雷”使得群众在流血中觉醒，而是力图使“全面爆雷”成为社会运动的总高潮和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停贷断供与房地产爆雷：谁之过，谁之殇？

July 24, 2022

江西景德镇恒大珑庭烂尾楼业主多次维权无果后，于 6 月 30 日声明，如果项目方无法在 2022 年十月底复工，将从 2022 年 11 月开始强制停贷。随后，潜在的停贷断供潮开始在全国蔓延。根据 GitHub 平台的一份统计，截至目前已有逾 319 份停贷通知，涉及全国 26 个省份。对于这场风波，各方意见不一。一些人联想到了 2008 年的次贷危机，表达了对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忧。而按照中国农业银行的说法，存在“保交楼”风险（即开发商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业主交付已经预售的房屋）的楼盘涉及的逾期按揭贷款仅占全行贷款余额的 0.012%，即可能的坏账率很低。我们姑且认为银行发布的声明是可信的，姑且认为这次特色黑帮的金融系统可以挺过去。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将使黑帮受到沉重打击的危机迟早要来临。根据官方 GDP 统计，今年的形势异常严峻。全面的危机即将到来，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此次断供潮便是这个大危机的前奏。

业主强制停贷，在资产阶级的报刊看来，是值得同情的，但不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从实际操作来看，贷款是业主个人申请的。根据法律，住房贷款是业主与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预售房屋是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债务关系，因此开发商没有按期交付，与银行无关。业主单方面停止还贷，就是个人违约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地产商违约

或银行违约，仅需要承担有限责任，个人违约却需要承担无限责任。但是，这个过程从现实的资金流向来看，是银行资本家将一部分货币资本借给地产资本家，使后者预先实现未完工的住房商品价值以便扩大再生产。所谓能够增加流动性的信用制度，无非是为了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同时将风险全部转嫁给业主。

按照程序，开发商预售房屋所得资金需要存放在银行监管账户中，在项目未完工之前不能随意挪用。因此，舆论场十分关注此次风波究竟是谁的过错：到底是银行违规给开发商开了口子，还是开发商没有将预售款存放在监管账户，或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我们的刁盘侠胡锡进继续和稀泥，一面安抚广大业主，一面呼吁让烂尾楼盘活起来，闭口不提黑帮政府在房地产行业扮演的角色。不过，郑州某银行行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指出，没有房管局的盖章，银行无权将开发商监管账户中的资金挪走，而如果监管资金的确被挪用了，便牵涉到违法犯罪，言外之意是房管局违法犯罪了。这真是宝贵的招供！地方政府这样不竭余力地冒着政治与法律风险为地产资本家开绿灯，无非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建筑投机继续拍卖土地，从而获取高昂的地租收入。然而，即便政府循规蹈矩，房地产商还是有很多手段提前回笼资金继续跑马圈地，比如设置多个银行账户，将贷款放在非监管账户，或者虚报工程进度，将监管资金套出来等等。通过拍卖国有土地可以获取巨额财政收入，黑帮政府有给开发商走后门的动力；房地产行业资本周转时间长，开发商也有尽快拿到预售资金进行新一轮圈地的动力；银行见

章办事，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很明显可以看出，这是政府、地产商与银行的合谋。但是与其说这是它们的“过错”，不如说是它们的阶级本性。特色黑帮、银行资本家与地产资本家一拍即合，在通向危机的大路上狂奔。

有人认为，地产商获得了超额利润，所以是高房价和停贷断供的罪魁祸首，应该负最大的责任。的确，开发商霸占富豪排行榜的现象会有一种地产资本获取了超额剩余价值的错觉，仿佛他们攫取了本应当归于地价的收益。以系统批判西方经济学闻名政治经济学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余斌也认同这个结论。余斌利用 2011 年广州保障房的投资额等数据，判断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为 81%，并引用任志强叙述的北京通州区的情况，计算出开发商支付的地价至多占房价的 62%。也就是说，开发商支付的地价远远低于实际地价。（《45 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128-135 页）那么我们也用数据来看看余斌的计算是否存在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商品房销售额为 18 万亿元；根据财政部数据，2021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7 万亿元，也就是地产商支付的地价占总房价的 48%，比余斌举的例子还低了一截。西部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查询省会城市 2021 年上半年高层住宅工程造价指标，估计大中城市高层项目平均建筑及安装成本约 2500 元/平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约 1 万元/平方米。如果只算建安成本，仿佛的确剩下的 7500 元都

是地价，从而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为 75%，与余斌的计算相差不大。如果余斌十年后再版他的著作，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痛斥房地产商。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这种计算漏掉了一些项目。以中国恒大 2020 年的利润表为例，营业收入 5072 亿，销售成本 3846 亿，毛利润为 1226 亿。由此可以推算出销售成本即为土地价格加上建安成本。但是我们还需要从毛利润中减去所谓分销成本（主要是纯粹流通费用）、行政开支（以手续费等形式交给政府的一般管理费用）财务成本（主要是交给银行资本家的利息）与所得税后才能得到净利润 314 亿，即成本利润率只有 8.2%。按照同样的计算方式，碧桂园的成本利润率也只有 9.5%。余斌使用的数据来源是政府主导的广州保障房建设投资而不是一般的商品房。这种住房投资额度约等于建安成本，省去了一大笔流通和一般管理费用及利息。如果将保障房不是按物化劳动的价值而是按包括了地价和上述费用的市场价格出售，政府赚的钱就很多了。因此，对剩余价值做了各项扣除后，地产商并没有得到所谓超额利润，罪魁祸首是实行土地招挂拍制度与土地财政的黑帮专制政府。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对土地国有化作了如下阐述：“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土地国有化（纯粹的国有化）的先决条件就是国家从农业企业主那里收取地租，而这些企业主付给雇佣工人工资并获得自己资本的平均利润。”“这里说的地租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

特种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特种收入——资本主义地租。”（《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6卷261页）建筑地段的地租与农业地租的原理是相同的。尽管中国的土地符合国有化的一般定义，但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下，人民无权对土地的使用和分配实行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很难从土地国有化中得到利益，反而被高昂的房价压的喘不过气。而纪录片《愚公移山》（1976年法国纪录片，记录了即将复辟的社会主义中国）告诉我们，当时的城市房租只占工资的约5%。因此，自复辟以来，黑帮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废除黑帮专制的土地国有化，实现劳动群众的土地国有化，为社会主义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准备条件，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可敬的余斌先生的结论客观上帮助了黑帮模糊人民的视线，将矛头对准地产资本家，将政府塑造成一个中立的办事机构。其最后开出的将卖地收入全部用于社保基金的药方也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这种改良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体现了其千方百计用马克思主义为黑帮政府打掩护的一贯作风。

我们再说回到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之所以看起来“赚钱”多，并不是因为从国家手中白白拿走了一部分地租，而是由于其负债率或者说杠杆率高。尽管利润率为总利润与预付资本的比率，但是如果借入资本远远大于自有资本，即使企业获得的是平均利润率，对资本家个人来说也仿佛空手套白狼般实现财富的增值。恒大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2.3万亿总资产中，包含着2万亿的负债，资产负债率高达

87%。

这些面临烂尾被迫断供的业主，很大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守信用、老实本分、按时还款曾经是这个群体的信条。他们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期待着有朝一日跻身上层，默默忍受着“暂时”的高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烂尾楼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此规模的断供潮在中国是第一次见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必然会分化的群体，这次断供风潮折射出了小资群体上升幻想的破灭。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讲述了硕博生和人才引进计划的高学历业主被现金补贴及房票吸引来买房却因工程停滞被迫维权的故事，有的人因为花过多时间维权甚至失去了工作。郑州市豫发白鹭源三期业主的公开信表达了危机时期整个社会生活条件带来的不堪忍受的处境：“当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征信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随时可以丢到垃圾桶的枷锁，这是我们万千百姓无奈的呐喊……我们万千祥子，要丢掉那些枷锁，让抢我们钱，砸我们车的人知道祥子不在（应为“再”，原文如此）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房地产项目烂尾不仅伤害到小资产阶级，还会伤害工人阶级。工人上层的工资允许其稍微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很多工人在县城贷款买房。然而相比小资产阶级，工人的发声渠道更有限，利用社会舆论维权更加困难。至于工人阶级下层，只要看一看中国大地上层出不穷的建筑业农民工讨薪事件就可以判断出，房地产资金链断裂将使建筑工

人的处境更加悲惨。恒大账簿上有 9500 亿的应付账款，占了总负债的一半。这其中便包括日常拖欠的工程款，也就是建筑工人的工资来源。中国的房产商历来将欠债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经营模式加上建筑业的劳务分包体制将深重的灾难带给无产阶级。建筑业无产阶级不仅要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还不得不在萎缩状态下再生产劳动力：工资被拖欠是常态，日常开支经常需要向包工头打欠条实现，生活毫无保障。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遮蔽了雇佣劳动关系，便利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将管理日常生产的责任下放至包工头，使工人与包工头形成依附关系，从而限制工人联合起来斗争的可能性。

中国的建筑工人有 5000 多万。在革命的准备期间，即使只把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为觉悟的有组织的工人先进阶层创造出来，也有 500 多万。这是一支足以令黑帮胆寒的大军。这个准备工作首先要求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共同的政治报下，通过与来自外部的反革命势力与来自内部的机会主义势力作斗争，建立统一的原则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迈出了这个第一步，埋葬特色黑帮、重建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不远了。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主义与机会主义

西江月 • August 02, 2022

在之前关于 003 号航母的评论文章 (<https://telegra.ph/阶级地位与政治立场的错位> 003 号航母下水值得我们欢呼吗-06-28) 中我们曾指出, 劳动群众不应被统治阶级鼓吹的“保卫祖国”之类的虚假口号所欺骗, 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只有始终如一地进行原则坚定的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 利用一切社会矛盾, 领导和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统治, 开展国内战争, 为夺取政权而努力, 才是正确的选择。而只要无产阶级进行这一系列活动, 则必然削弱资产阶级政府对外战争的能力, 从而在客观上推动本国政府的失败。同时, 本国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又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对于这一策略, 列宁将其总结为一句经典的口号: “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列宁全集》第 26 卷)

一百多年来, 围绕这一被简称为“失败主义”的口号产生了诸多争论。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但在左翼内部依然对此存在质疑和不同的理解。今天,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 随着美帝国主义霸权力量的衰落, 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 随着各国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 许多人都认为当今的世界局势和一战前极其相似。对于中国来说, 最近由佩洛西计划访台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再次热烈讨论起中美帝国主义竞争下台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虽然

无法准确预测台海冲突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但毫无疑问，革命左翼应当对这一重大问题形成正确认识，以在将来必然爆发的战争中站稳立场，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回应关于“失败主义”的主要批评意见和错误理解，反对各种“左”和右的机会主义，明确“失败主义”的真实内涵。

1、号召使本国政府失败是否会导致遭受外国的“奴役”？

反对“失败”口号的第一个理由是：本国的失败意味着他国的胜利，胜利者会奴役本国，从而导致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因此，为了防止失败，应该暂时放弃国内阶级斗争，全力支持政府的战争行动。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和沙文主义者都宣扬本国参战是防御性质的，是为了反抗侵略，使人民免受霸权的欺凌。一贯的调和主义者托洛茨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沙文主义，提出了“不胜不败”的口号，试图把“保卫祖国”和“国际主义”糅合在一起。

列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出，对于劳动者来说，“本国获胜还是失败”的问题提法首先就是错误的。“是的，如果忘掉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忘掉社会主义，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是作为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死于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呢，还是为举行奴隶之间以推翻奴隶制为目标的‘联欢’而甘冒生命的危险？这才是真正的‘实际’问题。”

（《一个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实例》，《列宁全集》第26卷）沙文主义

者恰恰是用“民族国家”的话语掩盖了“阶级”话语，从而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放弃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奴仆。而所谓“不胜不败”的口号不过是“保卫祖国”的另一种说法，因为不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阶级斗争，而在战时打击自己的政府，就是“叛国”，就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不胜不败”的骑墙策略。

那么，社会主义者要如何具体回应所谓遭受外国奴役的问题呢？

一方面，本国政府的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失败。统治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将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因此，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革命行动将削弱国家的防御能力，由此带来的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必然使本国遭受外国的奴役。在他们眼中，人民的力量是不存在的，他们实际上也不相信人民能够采取有力的革命行动。机会主义者没有想到的问题是：难道本国的反动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劳动人民就会甘受奴役，而不会拿起武器继续抗争吗？难道人民一定要将自己的命运绑在资产阶级的战车上，而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人民难道只能在受本国统治者奴役和受外国统治者奴役之间二选一吗？历史证明了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战败了，但俄国人民却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通过十月革命得到了解放，并战胜了外国干涉，取得了内战的胜利。说政府一旦失败，国家和人民必然会受奴役，这只不过是统治者吓唬人的鬼话罢了。而机会主义者的庸俗二元对立思维，使他们陷入了胜利

还是失败的陷阱，却恰恰看不到人民力量能够创造的新路。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没有人能担保革命一定能胜利，一定能制止战争，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下阶级力量的对比，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真正的问题是：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还是要将无产阶级事业的前途断送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怀抱里。

另一方面，“失败”的号召是对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说的，而不只是针对本国，是要使每个国家和所有政府都失败。“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在他看来，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方法论’！为了帮助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们，伯尔尼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0 号）曾经解释说：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现在都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 26 卷）在帝国主义时代，真正能够制止战争和侵略的只有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如果各国无产阶级能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起反对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并取得胜利，那么，所谓受外国奴役的问题自然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2、失败主义是不是幻想和冒险？

看完上一段的分析，一定会有人说，“使每个国家和所有政府都

失败”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和幼稚的冒险，因为交战一方的无产阶级在执行“失败主义”的策略时无法保证交战另一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够摆脱“爱国主义”的情感，同样执行国际主义的革命策略。那么，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思考的是：是不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持沙文主义立场，为了“保卫祖国”我们自己就可以不持国际主义和革命的立场了呢？当然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和不同步的，我们所说的国际联合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形成，也不可能是在所有参战国家的无产阶级签订某个协议的情况下出现。“失败主义”的策略是国际性的，但需要有某个或某些国家先行一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首先行动，就不可能增进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互相信任，不可能形成各国革命运动的配合和互相促进，整个世界也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劳动者永远走不出被奴役的命运。只有在得到他国无产阶级也执行国际主义革命策略的保证下，自己才奉行革命策略，这无疑是等待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想法。

“要达成革命行动的协议，也只有依靠真正革命行动的范例，也只有着手进行和发展真正的革命行动。而要着手进行革命行动，又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促使自己的政府失败。”（《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从历史来看，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国列强的干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和士兵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反战运动，大大牵制了列强的反动

力量，从而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条件。虽然期望中的欧洲革命胜利未能实现，但这依然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正是用自己“失败主义”的革命行动为世界开辟了新路，也实现了俄国人民的解放。

3、失败主义是否意味着借助外国力量来争取革命空间？是否意味着寄希望于政府的失败来加速革命？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失败”口号是想借外国的力量来帮助国内的革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失败来加速革命，因而是一种政治投机。德国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就曾经以此来批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德国社会民主党丝毫也没有想过要让外国敌人打胜，要借外国敌人的帮助来实现国内政治方面的自由要求。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那是丧失理智。德国社会民主党决不接受这一类建议而不管它是出于什么动机。”

上述的政治投机心态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列宁所说的“失败主义”的真实内涵和立足点。列宁曾明确指出：“我们只承认针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也是完全无用的。”（《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3卷）无产阶级奉行失败主义的原则，应当寻求帮助的不是外国统治阶级的胜利，而是外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

胜利，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各国资本家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联盟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联系现实来看，所谓“联帝反修”“左右合流”的观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因为他们不是将革命的立足点放在无产阶级艰苦、细致的工作和自身力量的壮大之上，而是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模糊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试图依靠外部的其他资产阶级力量来反对本国的统治者。无主体，无组织，就谈不上策略。脱离主体性和自身力量的策略必然会沦为到处寻找力量以求依附的机会主义。

与此相联系，我们还要警惕和反对另外一种看似革命实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那就是加速主义。有些人机械理解“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的口号，将这里说的“希望”唯心主义地理解为完全是主观的。他们不能客观看待本国的真实情况，低估本国政府的能力，带着某种“逆向民族主义”的眼光，片面认为本国资产阶级一无是处、软弱无能，因而必然在对外竞争的一切领域中都遭到失败，从而削弱统治力量，为革命创造条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与“帝国崛起”的基本判断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中看不到革命的希望，放眼望去绝大部分都是在剥削压迫面前无动于衷的群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本国“失败”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灾难会促进群众的觉醒和反抗。

这种“加速主义”的思想希望“革命”（实际上是动乱）尽快到来，希望恶魔降临人间进而使人们被迫寻找出路。在这一套充满着唯心主义幻想的想法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消极的等待“革命”，却丝毫

没有为革命积极准备力量的行动；只有个人至高无上的“崇高理想”，却丝毫没有关心群众疾苦的立场和情怀。“加速主义”实际上是想走一条容易的、轻松的、自身不用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和牺牲革命道路，然而，革命从来没有捷径可走。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与立足于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主体力量的“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毫无共同之处可言。

4、失败主义是否意味着以拒绝入伍、反战罢工、破坏基础设施等方式来抵制战争？

在革命阵营中还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我们希望政府在战争中失败，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拒绝入伍、反战罢工、破坏基础设施等行动来抵制战争，并以此来促进群众的思想转变。那么，这些看起来很“革命”的行动是否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呢？“应当指出，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罢工来‘回答’战争是不行的，同样，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来‘回答’战争也是不行的。应当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战争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般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列宁全集》第43卷）

一方面，拒绝入伍、反战罢工、破坏基础设施等抵制战争的行动看似革命，实际上却被“左”倾机会主义所裹挟。这些做法带有盲动

主义的倾向，没有意识到要形成足以战胜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必须依靠秘密组织细致、艰苦、深入社会各阶层的长期工作，而硬碰硬的做法只能导致有限的革命力量被反动政府摧毁。列宁尖锐地指出，“拒绝服兵役，举行反战罢工等等，纯粹是一种愚蠢行为，是可怜而怯懦地幻想凭赤手空拳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是梦想不通过殊死的国内战争或者一系列战争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同时，列宁特意提醒“敏感的读者”，促成政府的失败“绝不是说要‘炸毁桥梁’，举行没有成效的战时罢工，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帮助政府击败革命者”（《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

另一方面，这些做法高估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同时低估了“爱国主义”思想对群众的影响，低估了要转变大部分群众尤其是士兵思想的难度。列宁说：“‘保卫祖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我们应当说明，一旦宣战就立即会出现大量理论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使绝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根本不可能以比较清醒的头脑、比较公正的不抱成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列宁全集》第43卷）

事实的确如此。一战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布尔什维克一直在批判“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思想，但俄国的主流舆论依然是护国主义的。即使在二月革命后，列宁也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大

多数人持护国主义立场，对此我们短期是没有办法的，同时，低估农民的“爱国主义”是危险的。我们只有耐心地、坚持不懈地、系统地说明“保卫祖国”策略的错误，并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直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领导下的俄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战败，证明自己不能也并不是真的想“保卫祖国”，无法给人民提供“和平、土地和面包”，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失败主义”革命主张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尤其是士兵的支持。群众意识的转变，一是靠社会生活和实际经验的教育，二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坚定的、有组织的、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试图依靠单独的、不系统的破坏行动和决战行为来改变群众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可见，“失败主义”是“保卫祖国”的对立面，其出发点为了反对基于国家主义立场、阶级合作立场而产生的机会主义。“失败主义”的立足点在于揭露各国统治者利用国家主义欺骗群众的事实，在于通过国内战争形成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并领导劳动群众前进，在于推动各国劳动者基于国际主义立场的联合和团结。“失败主义”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本国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试图借外国的力量来为本国革命创造空间，从而走向另一种机会主义。失败主义绝不是政治投机，它其实意味着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加困难的斗争。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

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9 卷）“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存和建立所有参战的革命者的秘密组织，以进行长期的反战活动——应该把这一切提到首要地位。抵制战争，这是一句蠢话。共产党人应当投身到任何反动的战争中去。”（《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在社会各阶层中反复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反对政府的军事拨款和军备扩张，反对战时管制，争取言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着重在工人和军队中建立秘密的小组和支部，支持和领导广泛的阶级斗争，组织力量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巩固革命政权，推动建立各国劳动者的统一。这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必须完成的艰难任务，也只有这一任务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任务。